

【世界文学史新建构的中国化阐释】 主持人:方汉文

[主持人语] “世界文学史新建构的中国化阐释”是当代世界文学研究中的新话语。其产生的语境是美国与中国学者率先提出的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的观念,这种新建构必然产生了中国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者们的阐释。2012年起,这一话语被列入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教育部课题,由来自全国大学的学者共同研究。从文本来看,21世纪初期国际学术界有三套篇幅较大的世界文学文选(以下按出版时间排序):哈佛大学教授戴维·达姆若什(David Damrosch)主编的《朗曼世界文学文选》(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2008);方汉文主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教材系列》(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马丁·普契纳(Martin Puchner)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文选》(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2011)。此次发表的哈佛大学达姆若什关于世界文学教学的论文是一篇重要论文,文中所提出的世界文学多元主体性的观念其实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史新建构”的理论纲领。而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得主莫言与南非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的研究,则表现出中国比较文学的世界性视域,当然也是一种跨越文化与学科的研究。这里特别要提到,与莫言小说相关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特别是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研究,将会随之展开。

## 《耻》:后殖民语境中的权利与暴力书写

黄 晖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 库切是当下欧美文坛最有阐释争议的作家之一。在他的大部分小说中,后种族隔离时期的权利与暴力始终都是阐释者无法忽视的历史文化课题。文章运用后殖民文化理论,从文化批评的视角重新解读他的小说代表作《耻》,探讨后殖民语境中的权利与暴力书写,认为库切深刻探讨了作为殖民后裔的白人在后殖民时代的南非所遭遇的生存和精神困境,表现出对南非历史的反思、对新南非现状的忧虑以及对南非未来的希望。

[关键词] 库切;《耻》;后殖民语境;权利;暴力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3)03-0080-05

作为当下文坛颇具阐释争议的流散作家,现居澳大利亚的南非小说家库切(J. M. Coetzee)备受关注并获得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但在南非国内却受到评论界的批判。在其小说代表作《耻》(Disgrace,1999)中,库切通过男主人公卢里教授的叙述视角,展现了南非在欧洲殖民体系瓦解之后的历史图景。南非是一块历史和文化都非常特殊的地域,长期以来遭受西方的殖民统治,殖民主义问题是不可回避的社会敏感话题。《耻》在介入这一问题时

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它检视的是殖民主义已经消退,种族隔离政策被取消后的南非。呈现在他笔下的南非并非人们所期望的种族合一、世界大同的理想境地,而是大量不尽如人意甚至触目惊心的残酷现实,诸如土地所有权纷争、犯罪率上升、种族分离、警察的无能为力和白人的赎罪心理等。小说基本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卢里教授在开普技术大学的性丑闻,女儿露茜在边缘乡村的不幸遭遇,他和女儿对这一事件的不同处理方式。就小说本身的

[收稿日期] 2013-03-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世界文学史新建构的中国化阐释”(项目编号:12AZD09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库切小说诗学研究》(项目编号:10CWW010),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库切与后殖民流散文学》(项目编号:08JC752009)。

[作者简介] 黄晖(1971-),男,江苏丰县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隐喻结构而言,《耻》的多层含义既包括卢里作为大学教授引诱学生梅拉尼的“道德之耻”,也背负着女儿露茜被黑人强奸的“个人之耻”,同时也暗含着白人殖民者及其后代在非洲解放独立之后遭受欺辱的“历史之耻”。<sup>[1]2</sup>

## 一、欲望与权利:一厢情愿的对话与沟通

《耻》的文化语境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种族隔离时期,当时南非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说通过一连串的事件,表现了白人应以何种身份定位在记忆与遗忘之间进行对话与沟通的问题。库切在一次访谈中,提及南非的白人书写是一种“已不是欧洲,但尚未成为非洲”<sup>[2]423</sup>的书写。在库切看来,所谓的白人书写就是一小部分南非白人仍怀着欧洲人文价值中心或人类学的迷思,希望用类似人类学的“科学”方法和西方理性思维来“善意”地描写黑人处境。库切希望通过对白人书写的反思与质疑,作为书写南非并重新出发的起点。

《耻》的男主人公卢里教授,在创作上遭遇到挫折并且难以和周围环境沟通,所表现的正是白人书写的困境。卢里在开普技术大学教书,是研究华兹华斯的专家。他在课堂上试图以华兹华斯的作品《序曲》进行所谓的启发式教学,让学生把诗中所体现的浪漫和崇高与南非的风景进行联想,然而学生却无动于衷,无法体悟卢里的良苦用心。卢里的尴尬其实是隐喻了白人书写在走向本土化的新南非时所面临的尴尬。当他慨叹学生的肤浅无知时,其实未必是学生缺乏思考与联想的能力,而是他强人所难,一厢情愿地以华兹华斯的视角来看待南非风景,本身就不符合文学规律。这其实也是库切反思南非历史的一种方式,虽然南非曾经是欧洲的殖民地,但南非的文化和历史与欧洲却有天壤之别,具有欧洲文化传承、身为大学古典文学教授的卢里在南非成了格格不入的存在。

卢里的一厢情愿也反映在他和女学生梅拉妮的“恋情”上。他以拜伦为师,醉心于拜伦和有夫之妇特雷莎的不伦之恋,矢志完成《拜伦在意大利》的歌剧。在现实生活中,则自奉为浪漫主义的信徒,爱欲之神的仆人。虽然离过两次婚,却乐于在同事的妻子、观光客、妓女之间不断进行情欲冒险。他和女学生梅拉妮的“恋情”之所以演变成强暴事件,就是他自认为受到爱欲之神的召唤以至于情难自禁,不断把自己的行为美化、浪漫化和崇高化的结果。在两人关系中,卢里处于拥有支配权力的“教授”这一敏感角色,不自觉地操用了这种权利。很显然,此时的卢里是崇尚一种违背世俗道德伦理的

两性关系的。具体来说,首先他不认为两性间的关系需要受到道德伦理的束缚,因为那只属于个人私生活的范畴;其次,他也不认为做爱欲之神的仆人有什么错,反而认为欲望的权力“起因于甚至一只小鸟也会颤抖的神”,并将欲望权利的实现当成自己的精神寄托。在和梅拉妮发生关系之后,他甚至断章取义,试图给自己堕落的行为寻求到精神根源,把自己对性关系的追求比作了浪漫主义诗人笔下“感官之焰熄灭前的最后一跃”,仿佛是要通过对激情的追求、欲望的满足来摆脱枯燥乏味的现实生活。

卢里的性丑闻因为种族问题而变得更加复杂,最终难以收拾。女学生梅拉妮是有色人种,而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法罗迪亚·拉苏尔也是有色人种,她指责卢里“他说了,不错,他有罪,可当我们试图了解细节时,突然发现他要承认的不是侮辱了一位年轻女子,而是无法克制自己的冲动对他造成的痛苦,对他长期以来像这样利用职务之便,却只字不提。”<sup>[1]59</sup>拉苏尔的指控不仅包含父权及学术上不对称的主宰/臣服关系,也包含了种族差异:卢里和女学生的暧昧情事被扩大化,被放在几个世纪以来殖民历史中白种男人对有色女人的性剥削来检视。卢里和调查委员会之间的分歧,是调查委员会要求他准备一份声明并公开忏悔认罪,然而这项提议被卢里拒绝。他承认自己有罪,但认为此事应该限于法律层面,公开忏悔认罪已超越了法律层面。卢里不肯妥协,他说:“在这民间法庭上我承认有罪,那是民间性质的承认。这样的承认应当就够了。说什么也谈不上悔过的事。悔过属于另一个世界,属于另一种言语范围”。<sup>[1]64</sup>或许是信服拜伦的性别观念,或者是崇拜劳伦斯的男性意识,曾经作为文学教授的卢里欣然接受上帝为人类安排的原罪惩罚,他拒绝学校方面给他悔过自新的机会。

## 二、颠倒的身份与扭曲的人性

与这段荒唐的“恋情”相呼应的是他在歌剧《拜伦在意大利》创作的灵感枯竭,以至于要靠着阁楼里翻箱倒柜找到小孩玩的班卓琴,弄出“愚蠢的噪音”或者把农庄上那些被安乐死的狗的哀嚎,作为《拜伦在意大利》二重唱的最后—个哀悼音符。歌剧创作的失败表征着西方文明增殖力的丧失,反映了卢里对前途和命运的茫然不知所措,随之而来的身份迷失显现出殖民主义消退后给殖民者本人造成的伤害。他头脑中对于《拜伦在意大利》这部音乐剧的想象贯穿了自己每一个行动,在第二十章最为显著,卢里在各种矛盾爆发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去考虑现实的生存,而是沉浸在自己

的心理想象之中，他勾勒的拜伦与他自身形成鲜明的对照，拜伦还是那个古典浪漫并略带悲剧色彩的拜伦，而卢里依旧在南非黑色土地上迷失。卢里的经历与拜伦的生平与创作逐渐形成某种程度上的互文关系，拜伦及其笔下的人物都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的，但卢里却是一个无能、耻辱甚至卑琐的形象，成了一个现代社会的“反英雄”。

卢里因强暴案辞职，到东开普敦萨莱姆女儿露茜的农庄去避风头。未料女儿农庄的黑人雇工佩特鲁斯阴谋策划、唆使他的亲戚伙同另两名黑人，在深夜闯入露茜住宅，放火烧了房子，暴力攻击露茜和卢里，并且轮奸了身为女同性恋者的露茜。佩特鲁斯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赶走露茜，取得她的土地。库切在《耻》一书中，固然对卢里所代表的白人书写及沙文主义加以质疑和反讽，但是他也不愿意对翻身做主人的黑人一味地加以美化。《耻》中的佩特鲁斯早已脱离了许多白人书写中的两极化形象：单纯、无辜的受害者或野蛮愚蠢的暴力分子，佩特鲁斯的角色远比这两者还要复杂暧昧。库切为这位黑人雇工取名佩特鲁斯，并非偶然。佩特鲁斯这个名字也曾出现在纳丁·戈迪默的短篇小说《六尺之乡》(Six Feet of the Country)中。这篇小说描写一群黑人农场工人，想埋葬去世的家庭成员，却未获允许，这群工人中有一个谦卑低声下气的人，名字就叫佩特鲁斯。库切《耻》中的佩特鲁斯却是截然不同的黑人，他被卢里称为“这个新的佩特鲁斯”，是个野心勃勃诡计多端的黑人，随时准备夺回“六尺之乡”或更多。库切显然有意以他书中的佩特鲁斯和戈迪默的小说产生互文性，一方面反映了黑人与白人历史地位的翻转，另一方面也切入历史记忆，探索历史沟通与对话的可能性。不论是好是坏，佩特鲁斯代表了白人无法掌控的黑人新一代，他用机器取代了手工犁田，在卢里的眼中，“速度很快，而且按部就班，简直不像非洲人办事。”<sup>[1]</sup><sup>169</sup> 库切以佩特鲁斯来反映南非黑人的改头换面，他的机械化耕作方式反映南非乡村也“加入了全球化那惊异的步伐”。<sup>[3]</sup> 佩特鲁斯带给白人的威胁，不仅是肉体上的，也是心灵上的，即使在强暴事件发生后，卢里证实佩特鲁斯是幕后主谋，也凛于他的强硬和有恃无恐，而想不出办法叫他卷铺盖走人。佩特鲁斯不是种族隔离时期那种谦卑恭顺、忠心耿耿的黑人，而是抓住机会趁虚而入，工于心计，善于和白人周旋的黑人。

在库切小说的后殖民世界中，曾经作为黑人奴隶的佩特鲁斯俨然成为“自由帮佣工”和“农场合伙人”，曾经作为白人老爷的卢里却不得不“给佩特鲁

斯搭帮手”，目睹女儿露茜被三个黑人强奸和抢劫而无能为力。卢里颇为意外地发现，当地的黑人警察对此类事件是无可奈何，而自己作为已经失势的白人阶层更是无计可施，因此他不无伤心地断定，这次的黑人强暴事件是露茜的秘密，也是他的耻辱。佩特鲁斯是普通的黑人，他之所以成为农场事件幕后的操纵者，完全是殖民统治者当年的罪恶给被统治者身心留下的沉积已久的愤怒所导致的。农场事件说明了黑人的所作所为只是当年白人殖民者对黑人被殖民者的殖民主义罪恶的真实折射。在殖民主义消退后，以佩特鲁斯为首的黑人集体在满足和报复中释放自己，这是一种被历史扭曲了的人性。库切这样描述他曾身处其中的南非社会，“在一个只有主人和奴隶的社会，没有人是自由的。奴隶不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自己的主人；主人也不是自由的，因为没有奴隶他不能做任何事情。几个世纪以来，南非是主人和奴隶的社会。现在奴隶们开始公然反抗，而那些主人则处于一片混乱之中。”<sup>[2]</sup><sup>96</sup> 南非主奴关系二元对立的现实使南非处于一种不断对抗的社会状态之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社会问题都和这种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种族主义的消除。

### 三、女性身体作为重塑记忆的场域

小说中露茜因遭到三个黑人强暴而衍生的种种效应，隐喻着后种族隔离时期的种族暴力事件也借着被暴力入侵的身体(尤其是女人的身体)，来检视自我/他者关系的颠倒或翻转，并把身体作为重塑记忆的场域，来探讨族裔对话与沟通的吊诡性。对于父女两人对强暴事件的处置，评论者有正反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葛瑞姆认为，库切把强暴场景设在东开普敦，是为了强调种族、性别及土地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她指出在英国殖民时期，通过《原住民土地法案》对黑人的土地买卖和土地拥有权进行限制，以防止“黑祸”的蔓延，因此在后种族隔离时期，土地便成了黑人反抗浪潮中暴力抗争的疆域。<sup>[4]</sup> 至于土地和性别的关系，库切本人在《白人写作》(White Writing, 1988)一书中提到，在殖民时代有关领土的论述往往被性别化，把农夫比喻成丈夫，监护着“女性化的土地”(feminine earth)。而在后种族隔离时期，黑人权利大增，上述“性别化的土地论述”则被黑人父权社会挪用，成为其用以排斥女性成为土地和房产所有人的手段。露茜被强暴的事件，一方面反映了黑人运用族裔暴力夺取土地的手段，一方面也因为身为女同性恋的露茜，成为农庄的所有人，并未得到当地民情风俗的支

持,才使得佩特鲁斯有恃无恐,设计强暴她后,进一步提出婚约,让她成为第三任妻子,以保护她成为农庄的共同拥有人(byowner)。在南非当地的语言中,byowner不再是平等互惠的意思,而是“依附”的意思。

卢里强暴梅拉妮和佩特鲁斯强暴了露茜,是平行发展的结构,而被强暴的两位女性当事人的沉默,也反映了西方经典文学传统和强暴场景之间的危险关系:强暴被认为是不可说的,也是不可表征的。但是把强暴定位在私人的领域,认为是禁忌而欲言又止,其实是把女人遭受暴力的创伤痛苦琐碎化,甚至留下暧昧的色情想象空间,而让读者将强暴美化。

但是,我们不妨拉长时空距离,把露茜被强暴事件放在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框架内来思考,并联系库切其它作品的强暴事件,如《等待野蛮人》中那个被帝国军队凌虐强暴至半瞎半跛、全身疤痕的土著女孩,我们会发现,被强暴的女人由非白人变成白人,显示了时空变换中的自我/他者关系的翻转。另一方面,在暴力入侵的场景中,那不可言说、受苦受难的白种女人或非白种女人的身体,正是克里斯蒂瓦所谈的“贱斥身体”(abject body)。<sup>[5]</sup>这个被贱斥的身体,既不是历史的客体,也不是历史的主体,无法被吸纳为象征系统的语言符号;不能被完全遗忘,也不能被完全记忆。

露茜的身体作为重塑记忆的场域,来进行历史沟通与对话,其最大的意义是完全的自我否定,即放弃一切既得利益,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他者的位置,承受一切屈辱。露茜和《等待野蛮人》中被强暴的土著女孩最大的不同,是后者别无选择,但露茜却大可采取法律途径或一走了之,然而她却选择了最屈辱的妥协。露茜的选择,乃是对自我/他者、黑人/白人关系的挑战。诚如德里达所言,和他者极度的邻近会造成时空错置,而时空错置的断裂则使他者有可乘之机,使得个人可以和那些萦绕于现在的人、事、物,或者那些背负历史烙印的受难者建立伦理道德关系。<sup>[6]</sup>

#### 四、慈悲与救赎的寓言

库切通过露茜对强暴事件的反应,以及父女两人对此事的讨论,把代表西方现代性的法律及伦理推到边缘极致的境地,来探视族群和解的伦理道德底线。卢里建议露茜去报警,把佩特鲁斯和罪犯绳之以法,并且卖掉农庄,远离这危险之地,以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露茜拒绝离开农庄,她的理由是强暴案已发生,并深植在她的意识之中,不论到哪里都不能改变这一即成事实;而离开萨莱姆就意味着

逃跑,承认失败。她选择的是留在原地,止痛疗伤,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她也拒绝报警,让暴徒绳之以法。卢里警告她,姑息养奸并不能免除暴力的伤害。露茜坚持这是她的私事,不要他插手。卢里困惑地问:“你是不是想搞什么秘密解脱?你以为忍受现在的苦难就能偿清过去的罪恶?”露茜回答:“不。你一直都在误解我。什么罪恶感,什么解脱,那都是抽象的概念。我做事不是按照抽象概念来的。”<sup>[1]126</sup>在对强暴案的处理上,库切一直保持着露茜动机的暧昧性和悬疑性,使其犹如宗教寓言那样存在着待解之谜。在另一次父女对谈中,露茜流露出欲为历史赎罪的心情,“他们觉得我欠了他们什么东西。他们觉得自己是来讨债的,收税的。如果我不付出,为什么要让我在这里生活?”<sup>[1]127</sup>

露茜认为暴力事件和过去白人在种族隔离时期所犯的罪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不论对错,黑人通过暴力事件讨回他们该有的——包括土地在内。露茜最后选择了最屈辱的条件:她怀了强暴犯的孩子,把土地过户给佩特鲁斯,自己屈居他的第三个太太(维持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露茜的抉择,也寓含着库切展望南非白人的未来出路:要留在这块土地上,就得放弃既有的特权和利益,怀着谦卑、宽容与慈悲的心,重新开始。正如露茜所言:“是很丢脸。但这也许是新的起点。也许这就是我该学着接收到东西。从一无所有开始。”<sup>[1]228</sup>这样的自我否定,不是根据崇高的理念和抽象法则,而是把自己放在那当初为自己所贱斥的他者所面临的物质条件与历史情境,重新来过。也许这是对白人在种族大和解中所愿意付出的底线的最大考验。

露茜借着和他者的极度邻近性,和他者易位而处,所建立的伦理关系已经超越了西方现代性对自我/他者的辩证理解,也超越了社会伦理的极限,而是近乎宗教的救赎。不少文学评论者认为露茜被强暴事件及最后的选择,乃是通过屈辱的途径,达到慈悲与救赎的寓言。这样的寓言似乎也暗示了作者库切的态度:族裔间的沟通与对话不能仅从社会制度和法理层面上去解决,而是带着宗教境界的反省、宽容与慈悲,重新思考自我/他者的关系,进而悦纳他者。库切在《屈辱》中进行的伦理展演与实验,超乎黑/白二元对立,打破自我/他者的边界,甚至把动物伦理也包含进去。通过这样的他者伦理实践,不仅露茜,连卢里也通过屈辱的历程,达到慈悲与救赎。卢里最后选择留在农庄,协助狗安乐死,并让它们肢体完整地送入焚化炉,有尊严地死去。对无知无觉的流浪狗作这种煞费周章的安

排,看似徒劳而琐碎,却是卢里甘之如饴、日日进行的仪式。卢里这样的日常生活实践,乃是把伦理关系的边界从人与人扩展到人与动物之间,也是间接地抗拒南非乃至全球性日常生活秩序中过于强调功能主义的趋势。卢里谦卑地承担起狗的安乐死责任,也是对所有生命的尊重。无论是露茜选择生下她和强暴者共同的黑白混血儿,或者是卢里选择协助流浪狗庄严地安乐死,都超越了现实政治、法律和伦理的赏罚报应逻辑。他们经由日常的生活实践,真实地对待那些理性或规则均无法控制或解释的现象,进而将本身的痛苦升华,由厌弃到悦纳他者。虽然库切给我们讲述的是一个白人家庭父女间的遭遇,却完全超越了个人的经历而让其具有了文化和历史层面上的更为普遍、更为深刻的意义。

### 五、结语

一部伟大的小说总有其不可企及的艺术高度,它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当然也是不可以复制的,它总是表现出无限的阐释可能性,它总是表现出对于人性和心灵的独特感悟和深刻洞见。库切的《耻》无疑是这样一部小说,他以简练的笔触为世人呈现了一幅种族主义消退后的新南非图像,并证明“耻”不仅仅属于个人,而且属于整个社会。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所说的那样,库切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sup>[7]</sup>库切在《耻》中通过前后两次的强暴事件及族裔暴力事件,把种族问题中所涉及的伦理与人性在宗教、政治与法律层面的重叠与纠缠,进行了实验性的展演。而最后在法理的穷尽之处,他回归到西方文学传统的

解决方式:以充满宗教寓意的爱、忏悔和宽恕来启示未来的出路。然而有别于传统救赎文学的地方,是他揭示了从屈辱通往慈悲的过程中自我/他者之伦理关系的繁复变化与易位。库切的小说追溯着全球现代性随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衍生和变异的样貌,探索着后殖民历史书写、族裔暴力与族群和解所呈现的文化沟通和伦理抉择的两难与辩证,为全球化过程中的后殖民文学树立了别具一格的典型。

### [参 考 文 献]

- [1] 库切. 耻[M]. 张冲 郭整凤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 [2] J. M. Coetzee. Doubling the Points: Essays and Interviews [M]. Ed. David Attwell.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2.
- [3] Derek Attridge. Age of Bronze, State of Grace: Music and Dogs in Coetzee's Disgrace [J].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2000(34): 105.
- [4] Lucy Valerie Graham. Reading the Unspeakable: Rape in J. M. Coetzee's Disgrace [J].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003(29): 433-44.
- [5] Julia Kristeva. The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M].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2: 20.
- [6] 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22.
- [7] 库切. 等待野蛮人[M]. 文敏 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 214.

(责任编辑:程晓芝)

## Disgrace: Power and Viole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Context

HUANG Hui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China)

**Abstract:** J. M. Coetzee i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social novelist in Contemporary Euro-American literary world. In most of his novels, readers cannot ignore tho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pics such as power and violence in the period of post-segregation. Employing the postcolonial theory, this article rereads his novel *Disgrace* from an ethic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riticism, and explores the writing of power and violence. J. M. Coetzee explored the dilemma of the white in the postcolonial times and expressed his reflection on history, his worry about reality and his hope for the future of South Africa.

**Key words:** J. M. Coetzee; *Disgrace*; Postcolonial Context; Power; Violence

